中国音乐(季刊) 2008年第4期
CHINESE MUSIC

○ 宫宏宇

狄就烈、《西国乐法启蒙》、《圣诗谱》

摘　要 :美国人狄就烈是近代来华外国人中为数不多的把西方基本乐理系统地传授给中国学童的基督教传教士之一。本文利用罕见的中外文史料来对狄就烈在山东的音乐教育活动进行考证。其目的除介绍狄氏其人、其事,对比《西国乐法启蒙》的不同版本,厘清她所介绍的记谱法外,还将透过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视角来凸显狄氏的音乐活动在中外音乐交流史上,特别是在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 :狄就烈 ;《西国乐法启蒙》;《圣诗谱》;西洋乐理 ;有谱赞美诗集 ;符号记谱法
中图分类号 :J6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9923(2008) 04-0089-09

今年是美国传教士狄就烈(Julia Brown Mateer)逝世110周年。狄就烈与丈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63年7月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到中国传教,1864年1月抵达山东登州。同年9月在其创办的登州蒙养学堂中设立乐法课,系统地传授现代西方乐理知识和歌唱技巧。她的《西国乐法启蒙》是我国学界公认的最早系统介绍西方乐理知识的教科书之一。[①]由于她在音乐教育上所作的工作,基督教传教士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宣教会议上,狄就烈应邀和韦廉臣夫人(Mrs Williamson)一起为教会学校教科书系列编纂音乐教本《声乐和器乐》。[②] 狄氏也是最早鼓励学生利用民族音乐素材自己填词谱曲的传教士之一。到二十世纪初"学堂乐歌"兴起时,她的学生所写和所填词的歌曲已有数百篇之多。[③] 狄就烈本人对中国音乐也有一定的涉猎,早在1872年《西国乐法启蒙》初版时她就将基督教赞美诗中的各理各法用中国的杂调小曲为实例加以说明。她的《中文音乐词汇》也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出现在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编的《英华萃林韻府》中。[④]

对于这样一位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有过贡献的人物,中外的音乐学者当然不会不有所关注。王震亚首先从西洋乐理输入中国的角度概要地介绍了《圣诗谱》中传授的西洋乐理知识。之后,陶亚兵又从中西音乐交流史的视角简略地述及狄就烈《圣诗谱》中的符号谱。认识到《圣诗谱》的史料价值,张静蔚在其编选校点的《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中辑录了《圣诗谱》1872年的原序和1892年的补序。伍雍谊、孙继南则把登州蒙养学堂音乐课的开设和《乐法启蒙》的刊行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上的大事来记载。[⑤]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语汇形成的学者对《圣诗谱》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系教授格林德·吉尔德(Gerlinde Gild) 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朱京伟在相关的论文中都论述到狄就烈在传播西洋乐理词汇上所作出的尝试。[⑥]近年来,随着登州《文会馆志》中的十首乐歌的发现,更有学者就狄就烈教过的文会馆学生的乐歌习作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意义著文。[⑦]还有学者试图对《圣诗谱·附乐法启蒙》的成书缘由、全书的结构体系、主要内容等进行分析、归纳,并对该书的写作特色、历史价值、社会意义作客观的评价。[⑧]

以上的研究无疑为我们了解狄就烈在中西音乐交流上和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上的贡献提供了历史依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狄就烈生平的了解就非常有限。对她的音乐

收稿日期 :2008-05-18
作者简介 :宫宏宇(1962 -) ,男,奥克兰大学博士。曾就读于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音乐学院和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学院。从1997年开始任教于新西兰国立UNITEC理工学院语言研究系。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著作也只注重纵向的历史性追溯:即从徐日升、德理格的《律吕正义·续编》(1713)→狄就烈的《圣诗谱》(1872)→金楷理的《喇叭吹法》(1877)→曾志忞的〈乐理大意〉(1903)。而没有进行横向的(如同时期国内先后出现的有谱圣诗集和杜嘉德的一系列乐理入门书)、跨国界的(如同时期欧美各国的音乐教育情况)比较。所依据的史料也仅仅局限于1892年再版后的《圣诗谱·附乐法启蒙》和1913刊行的《文会馆志》中的"文会馆唱歌选抄"。本文拟通过目前所见的中外文资料来审视狄就烈的生平和她的主要著作《乐法启蒙》(《圣诗谱》)。除介绍有关狄就烈的一些论著、订正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关于狄就烈生平事迹的一些错误外,本文还拟通过比较《乐法启蒙》和同时期出现的几本有谱赞美诗集来凸显《乐法启蒙》(《圣诗谱》)在中外音乐交流史和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的意义。另外,笔者还想通过对比《乐法启蒙》的不同版本来厘清《圣诗谱》中所介绍的符号记谱法。

一、狄就烈其人、其事

有关狄就烈(见图1)的生平,国内早期的论著大多注明"生平不详",或"待查"。有的学者甚至把狄就烈的国籍误解为"英国",还有的学者把新教长老会传教士的她说成是天主教"耶稣圣会女教友"。前者显然是随《中国音乐书谱志》中所列《西国乐法启蒙》条目之误(页11),而后者则显示了对狄就烈宗教背景的不了解。令人遗憾的是,近期的学者不但没有改正以上的错误,还把这两个错误以讹传讹并在了一起,把狄氏称为"新教耶稣圣会女教友"。[9]



图1:狄就烈初到中国时的照片(资料来源:Mateer, 1912:22)

其实,有关狄就烈的文章很早就出现了,但大多是英文。狄就烈1898年2月18日去世后,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在同年3、4、5月号多次刊登对她表示的哀思的短文。这些文章(特别是狄就烈生前好友梅耐德[Annetta T. Mills]写的回忆文章)对我们了解狄氏的为人都很有帮助。[10] 除了回忆文章外,狄就烈的小叔子狄乐播(Robert M. Mateer, 1853-1921)还专门为她写过一本传记,书名为《人格构建在中国——狄就烈的人生故事,1912年在纽约、芝加哥、多伦多、伦敦、爱丁堡出版发行。

有关狄就烈的中文资料很少见,《文会馆志》中刊载的《狄夫人邦就烈事略》一文是目前所见的唯一的一篇。此文写于狄就烈去世十四年后的1912年秋。作者朱葆琛是文会馆光绪十四年(1888)的毕业生,狄就烈生前教过他。他对狄就烈的生平和早期活动的描述可以说是他自己耳闻目睹的实录。他的回忆除印证了梅耐德的回忆外,也为我们了解中国学生心目中的狄就烈提供了依据。

一手资料外,早期狄考文的传记和后来一些研究狄考文的专著也都提及狄就烈。如最早为狄考文作传的狄考文大学和神学院的同学丹尼尔·费舍(Daniel W. Fisher, 1838-1913)在《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中就屡屡提及狄就烈。郭查理(Charles Hodge Corbett)在其《山东基督教齐鲁大学》一书中追溯齐鲁大学的起源时,除了多次提到狄就烈早期创立登州蒙养学堂的功绩外,还特地提到她的音乐教学和她的《圣诗谱》。小海亚特(Irwin T. Hyatt, Jr)1969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专论美国在登州传教士的博士论文也有关于狄就烈的长篇论述。小海亚特甚至在其《圣使荣哀录——十九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一书中重申,如果没有狄就烈的默默协助,狄考文不可能那样成绩卓著,也不可能取得他后来"中国教会大学之父"的声誉。[11]

狄就烈,亦作"邦就列、狄邦就列",因为其婚前姓Brown,因而音译为"邦";"就烈"是她的名字Julia(现通译为朱莉亚)的音译。她是狄考文原配夫人,因为她1898年2月去世后,狄考文再次结婚。[12] 狄就烈1837年7月6日出生在位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Ohio)靠近德拉瓦(Delaware)城的一个农庄里。家中有兄弟姊妹六人,父母皆是虔诚的长老会基督徒。不幸的是,狄就烈八岁时母亲就逝去,十五岁时又遭丧父的打击,十八岁时就已开始自谋生计。狄乐播的书中提到她十九岁皈依基督教后曾积极参加教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了唱诗班的一员。通过唱诗活动,她不仅学到了乐理知识,还受到了良好的歌唱训练。[13] 1862年春,已完成神学课程的狄考文在德拉瓦宣道时与狄就烈相识并定婚。同年12月29日俩人完姻后,受总会派遣于1863年7月乘船由纽约启程来中国。经过167天的艰苦航行到达上海,1864年1月15日抵达山东登州。[14]

狄考文夫妇于1864年9月创办男童寄宿学校—登州蒙养学堂。关于此学堂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性,中外学者已有专著,此不赘述。[15] 需要指明的是,狄考文虽然名义上是学堂的"监督"(校长),但事实上学堂早期的实际工作都是狄就烈做的,就连开办的学堂的主意也是她首先提出的。狄考文早期由于忙于巡回各地传教,根本无暇顾及学堂的日常运作,直到1872年后他才开始全心投入办学。用狄乐播的话说"三分之二的实际工作都是她做的"。[16] 传教士出外传道,传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教士夫人在家办学堂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但像狄就烈那样兢兢业业的并不多。据海亚特说，狄就烈办学除了为传道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很早就知道自己将不会有子嗣，所以她希望通过办寄宿学校来把自己的亲情传给后代。[17]

狄氏夫妇在创建学堂之初，遇到了来自多方面的阻碍。首先是当地的民众不理解，而他们自己"既苦于言语未融，又苦于风土未谙"。[18] 在师资上，他们自己语言不通只能雇佣当地的老师，可是他们所能雇用到的"教习"大多素质不高。在工作上，非但不与他们合作，有些甚至暗地里与他们做对。这使得他们从 1864 到年至 1872 年的九年间不得不多次更换教师。在招生对象上，登州蒙养学堂早期所招收到的学生数量少不说，也大多天性散漫。更令他们气馁的是，连派他们来中国传教的美国的差会对他们办学之事也不理解，甚至觉得他们不务正业，在经费上不予支持。早期的登州蒙养学堂其实是他们自己掏腰包办的。但即使是这样，狄就烈仍能"综理微密，终日无倦容"。[19]

狄就烈办学虽说是受倪维思夫人 (Helen Nevius)1862 年成功创办女童学校之启发，但与她从小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她幼年时上的几所乡间小学校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她一直刻苦自学不辍。在上学期间，她除专注学业外，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社团活动，曾组织并担任哦亥哦州格安维 (Granville) 女子学院文学社社长一职。这些课外活动无疑为她日后组织文会馆各种社团(如辩论会、传道会等)奠定了基础。与同时期大部分主持教会学校的传教士太太不同，狄就烈在来中国之前不但已具备了专业教师的资格，而且有了一定的实际教学经验。[20] 她到中国语言稍通后就开始用各种通俗易懂的方式 (包括唱圣诗) 来讲授基督教义。在登州蒙养学堂的教学上也独当一面，历年来她教过的课程除音乐外，还有地理、历史、算数等。[21] 费舍在《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一书中提到，狄邦就烈"每个星期还有三次特别难做的工作要做，那就是教孩子们唱歌"。[22]

狄就烈虽然自己很早就失去了母爱，又曾遭继母虐待，但她却有一颗常人无法相比的爱心。这一点不仅所有的回忆文章都有提及，连后来的研究论著也都着重指出。[23]早期在山东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的子女大多受到过她的呵护。如狄乐播的原配妻子去世后，就是狄就烈把他的孩子抚养成人的。从 1908 年起就曾在多所教会大学任过教的山东传教士郭显德 (Hunter Corbett)之子郭查理也提到他小时候在烟台时，常听到大人们提起狄就烈的爱心往事。[24] 由于她的呵护和辛勤哺育"同学数百人皆畏之如严师，爱之如慈母也"。[25] 她过六十岁生日时，她的学生特送其镌刻有"育英寿母"的匾额一块，以表示感恩之情。狄就烈对普通的教友和穷人也充满了爱心。"其待教友也，或有疾病困难，必多方救护调剂，使之身安而心慰"。[26]

从 1864 年 1 月 15 日抵达登州到她 1898 年 2 月 18 日经过四个月的极端病痛后逝世，狄就烈除了短暂的回过两次美国外，共在登州居住了三十四年，比她在美国的时间还长四年。可以说她把大半生都贡献给了登州传教、办学事业。

二、《乐法启蒙》的版本、《圣诗谱》及所引进的符号记谱法、新教在华所编的赞美诗集

作为继《律吕正义》之后又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乐理的著作，狄就烈的《乐法启蒙》(《圣诗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但遗憾的是国内外学者都没有对此教科书的不同版本做过详尽的考证分析。因为初版本不易看到，大部分学者把 1892 年增补版的内容当作初版应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把狄就烈 1892 年改编后才采用的符号五线谱误认为是从一开始就用的记谱法。据较早开始注意此书的孙继南先生推测，"《圣诗谱》初版之后，重印版至少有过四次，即:1879 年(第一次)重印，1892 年(第二次)增补重印，1907 年(第三次)增补重印，1913 年(第四次)增补重印"。[27] 经过孙先生仔细查对证实，张静蔚辑录的《圣诗谱》1872 年的原序和 1892 年的补序以及陶亚兵的引文、谱例等，全都来自音研所藏书《圣诗谱》。值得注意的是，音研所所藏的《圣诗谱》的重印时间为 1907，是该书"第三次增补重印"，这一点以往有关论著在引用时一般都被忽略。

狄就烈的教科书初版于 1872 年是不争的事实，但起初书名是否是《圣诗谱》还有待商榷。因为狄就烈在 1892 年为《圣诗谱》出版所作的英文序言中曾明确地解释说:"本书的刊行虽然用了一个新的名字，但实际上它是《乐法启蒙》一书修订后的再版"。[28] 其中"乐法启蒙"四个字用的还是中文。这表明 1872 年首刊的书名应是《乐法启蒙》或《西国乐法启蒙》，而不是《圣诗谱》。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收藏的 1872 年的由基督教上海美华书馆印行的版本用的书名就是《西国乐法启蒙》。韩国汉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 1879 年版，同样也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书名也是《西国乐法启蒙》。以《圣诗谱》(内附《乐法启蒙》)为书名出版的版本最早应该是 1892 年，此后出现的版本(如目前常见的 1907 年、1913 年重印本)在内容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增补，即使是有改动，也不是狄就烈所为，因为狄就烈在 1898 年 2 月就去世了。

与 1872 年初版和 1879 年增补重印版相比，1892 年的《圣诗谱》除用了一个新名、加入了一些新赞美诗外，最重要的是在内容上的两项重大的改变 :1.增加了四声部歌曲 ;2.采用了一种新的记谱方式:美国当时最为流行的记谱法，即"七种形状符号 (Seven-Shape Notation) 记谱法"。对于这两项改动，狄就烈在 1892 的英文序言中都有清晰的说明。首先她提到她之所以在谱例中加入男高音和女低音的声部，主要是考虑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学唱四声部歌曲。值得注意的是，四声部歌曲的增加使《圣诗谱》在技术水平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世界学校音乐教学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如果我们把《圣诗谱》与欧美同时期出版的类似教科书做一个比较的话，这一点就可以更清晰的看出。美国堪撒斯 (Kansas) 大学教授乔治·汉勒 (George N. Heller) 对 1894 年发表的堪撒斯中小学学校音乐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教学大纲的研究表明,堪撒斯的公立学校到中学时(八年级)也没有教授四声部的歌曲,即使是带有少量半音的二声部歌曲也要等到六年级时才开始加入,较复杂的带有四个升降号的二声部歌曲是七年级的主要学习内容。[29] 另一美国学者崧德拉·豪(Sondra Wieland Howe)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版的瑞士公立学校音乐教科书的研究则表明,在欧洲中西部的国家,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只学唱二声部歌曲,上中学时才开始学唱三声部歌曲。[30] 而狄就烈所教的中国学生不仅能唱四声部的歌曲,而且能配多声部歌曲。《文会馆志》中的 10 首乐歌就是很好的例证。

关于《圣诗谱》舍弃传统的五线谱而采用"七种形状符号记谱法",狄就烈是这样解释的:"本书所采用的记谱法既不是一种旧的、已被淘汰的体系,也不是一种全新的、不为人所知的体系。节拍、音高、各种音阶的变调都和目前通用的记法完全一样。唯一的不同是加上了七种形状符号来代表唱名唱法(sol-faing)中的七个唱名

△, do; ▽, ri; ◇, mi; ◺, fa; ◡, sol; □, la; ♡, ti.

(资料来源:Mateer, 1892)

形状符号谱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在美国广泛流行的一种首调概念记谱法。最早用形状符号谱的歌谱集是 1801 年在美国费城出版的由维廉·里图(William Little)和维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编辑的《简易教员》(*Easy Instructor*),但当时所常用的符号只有以下四个:



只代表 fa, sol, la, mi 四个唱名。1846 年杰西·艾金(Jesse B. Aikin, 1808–1900)在其编辑的歌曲集《基督教歌手》(Christian Minstrel)里在这四个符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符号,分别代表 do, re, ti 三个唱名:



经过艾金改革后的这种记谱法也被人称为"艾金记谱法"。[31] 但艾金所用的七个符号并没有立即被接受,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有多种符号记谱法流行,但主要的有如下几种:

Name	Do	Re	Mi	Fa	Sol	La	Ti
Aikin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uld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Funk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Swan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Walker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资料来源: Hall, 1971: 75)

"艾金记谱法"在美国的风靡,主要得力于艾金《基督教歌手》一书的广泛流传。此书 1846 年在费城的首次发行,不到三十年已重印过上百次,到 1873 年已是第 171 次印刷,销售量高达 18 万多册。由于《基督教歌手》出版后的大受欢迎,这种具有七个符号的记谱法也在美国逐渐得以推广。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时,艾金所用的七个符号在教会歌咏书出版中已独占鳌头,为美国教民所普遍接受,成为公认的标准符号。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记谱法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被淘汰,美国南方的一些教会仍在用这种体系,如美国南方浸礼会 1975 年出版的《浸礼会赞美诗集》(Baptist Hymnal)用的就是这种记谱法。[32]

狄就烈对"符号记谱法"的采用从西洋音乐流入中国的角度来看是有历史意义的。我们知道,在简谱盛行之前,清末传人的首调概念的记谱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主音嗖乏(Tonic Sol-fa)"体系;另一种就是狄就烈《圣诗谱》中采用的这种符号记谱法。"主音嗖乏"法兴起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发明人为英国教会牧师约翰·格文(John Curwen, 1816-1880)。[33] 这种体系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就开始在中国厦门出现。[34] 此法引进到中国后,因为其简便好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颇受众基督教会青睐,通州潞河书院 1895 刊印的流传极广的《颂主诗歌》介绍的也是这种方法。[35] 与"主音嗖乏"体系不同,"符号记谱法"兴起于美国,狄就烈虽然不是最早引进这种方法的人(她在 1892 年版的英文序中说"不少的中国人已学会了这种简易的方法"),但目前所见的资料表明,她是最早在圣诗集中灵活的运用这种记谱法的传教士。这两种记谱法的发明都与新教教会有关,是为了教会歌咏便利而设计的,最适合初学音乐的人,适合教授简单的调性不复杂的音乐,对大众音乐普及工作极为有利。但像所有首调概念的记谱体系一样,缺点是无法解决比较复杂的音乐问题,对从事专业音乐的人来说,作用不大,只能说是学五线谱前的一个铺垫。这也是为什么符号记谱法这种体系虽对推动大众音乐有益,但却不受梅森(Lowell Mason, 1792-1872)这样美国公共学校音乐教育改革者青睐的原因之一。

狄就烈《乐法启蒙》一书初版和二版用的都是普通的五线谱,直到 1892 年整编《圣诗谱》时才改用符号记谱法,这一点,我们只需比较一下下面的两个"六八"谱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1879 年《西国乐法启蒙》的"六八"谱例)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892《圣诗谱》的"六八"谱例)

狄就烈为什么要采用一个有缺陷的记谱法呢?这要从她的来华的身份和她教授音乐所要达到的目的谈起。作为一个以拯救灵魂为终极目的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来说,狄就烈编写音乐教科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帮助各地的先生教导学生和教友们唱诗"。她一直"盼望中国会唱的教友们,得着一个好法子能自己学,又能教导众教友们学。如是大众可以同唱圣诗,颂赞天父"。[36]《乐法启蒙》1872 年出版时,她还没有找到符号记谱法这样一个能有效地教导学生和教友们唱诗的"好法子",不得已,她只好用现成的、自己熟悉的欧洲的固定调五线谱。但是,多年的教学证明,"尽快而且准确地学唱欧洲的正统五线谱中的各种音符及其移位转调是一项枯燥且困难的事情。"首调概念的符号记谱法在美国的广泛应用使她认识到这种方法较简单,用她自己的话说"采用这些不同的形状符号的目的就是为了学起来方便,歌者不用完全依靠音符的位置来确定音名,只需扫一眼音符的形状就可以一目了然"。[37] 以上说过,符号记谱法在美国的广泛流行也正是由于它简单易学。即使是会五线谱的人也借助于这种方法。[38] 事实上,狄就烈的这种做法也的确对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郭查理在其《山东基督教齐鲁大学》一书中谈到狄就烈的教学时就提到这种方法对"没有任何音乐知识的初学者极为有用"。[39] 但是,对于形状符号谱所存在的种种缺陷,如不用高低音谱号、尽力不用小调式、不用调号、简化节拍等,狄就烈并不是毫无所知。为了不给学生今后学习复杂的乐曲及演奏乐器带来负面的影响,狄就烈除了吸收了形状符号记谱法的七种符号和首调概念外,并没有根本改变以前用的五线谱记谱法。这表明狄就烈在力求方便学生,普及基本音乐知识的同时,也不忘为学生今后学习西方专业的音乐知识打好基础。从《圣诗谱·附乐法启蒙》中诸如音阶、节奏、节拍、音程、调式调性、转调、音乐术语、歌唱方法、演唱处理等记述方式来看,她所传授的仍然是欧洲正统的以五线谱为代表的现代乐理知识。[40] 当然,狄就烈并不是最早教授中国学生五线谱的传教士,但是,像她这样能随时采纳新的方法来改进教学的例子并不很多。[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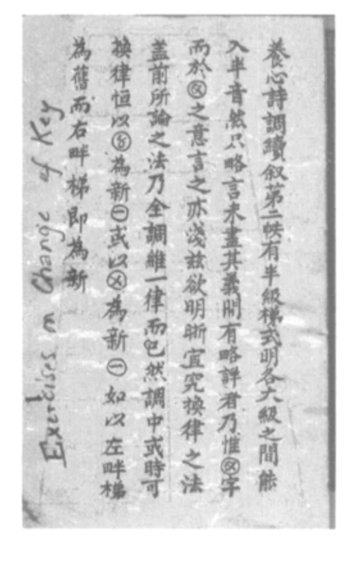
有学者说"狄就烈编著《圣诗谱》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的圣诗集",[42] 这是与史实不符的。早期传来的天主教圣诗集不说,最早在广州等地流传的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编的圣诗集《养心神诗》(1814)。鸦片战争前活动于广州、南洋诸岛与澳门的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 1796-1857)、李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黎力基(Rudolph Lechler, 1824-1908)等也都在《养心神诗》的基础上编辑出版过类似的赞美诗集。五口通商后,来厦门、福州、上海、宁波的传教士,如宾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等,也大多从事圣诗的编纂翻译与配歌工作,但这期间所刊行的圣诗集几乎都是用方言。[43] 狄就烈编的圣诗集只能说是天津条约签订后最早出现的官话圣诗集之一。[44]

早期出版的赞美诗集还有一个特点是大多只有歌词没有乐谱,只在歌词旁边标有所唱的曲调。而这些曲调几乎毫无例外,全是西方教会所常用的旋律。[45] 狄就烈编的《西国乐法启蒙》突出之处是它不但带曲谱,还带有当时来说最详细的乐理解说。但《圣诗谱》并不是新教最早的有谱赞美诗集。目前所见的新教最早的有谱圣诗集为 1856 年在宁波刊行的《赞神乐章》。此圣诗集是罗德(E. C. Lord)所编,由 24 首圣诗加总赞词组成。1858 年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应思理(Elias B. Insle)在宁波刊行了八十页的《圣山谐歌》(宁波:华花书房咸丰八年刊)。[46]1868 年范约翰夫妇也合作出版的圣歌集《曲谱赞美诗》。[47] 和狄就烈的《乐法启蒙》相同,应思理的范约翰夫妇这两本圣诗集均用五线谱。但不同的是,它们都用方言(其中应思理的歌集用的是用罗马字母翻译的宁波话),所包含的圣歌也不多。应思理的《圣山谐歌》虽有五页讲述基本乐理,[48] 但与狄就烈五十多页的《乐法启蒙》来比,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无法相比。上海浸信会 1876 年出版的《赞美圣歌》在第二部分虽有四十首用五线谱的二声部的歌调,[49] 但歌词和音乐是分开的,不如狄就烈《乐法启蒙》中的歌词直接列在旋律下的作法便捷。1877 年刊行的杭州美国南长老会所编的《福音赞美诗》中也附有一个类似《乐法启蒙》的章节,而且也采用了当时美国学校流行的对话的方式来介绍西方基本乐理知识,[50] 但都过于简略。福州监理会欧灵格夫妇(Mr. and Mrs. F. Ohlinger)在其 1878 年编辑出版的五线谱圣诗集《凯歌》中增加了几页关于读谱方法的解释和 120 首歌调,[51] 但在内容的深度上、形式的新颖上、教学方法的完善上还是无法与《乐法启蒙》相媲美。可以说,十九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在华刊行的以赞美诗的方式介绍西洋乐理的读物只有杜嘉德 1868 年至 1870 年在厦门出版的一系列的西洋乐理入门书和英国浸信会李提摩太夫妇 1883 年在山西太原出版的教科书《小诗谱》可与狄就烈的《乐法启蒙》相提并论。[52]

杜嘉德自 1868 年开始在厦门出版西洋乐理入门书,这一系列书籍,包括以上提到的 1868 年出版的《养心诗调》、1869 年出版的《乐法启蒙》、和 1870 年刊行的《乐理颇晰》及《西国乐法》。[53] 特别是《养心诗调》(见例 1)书中尝试以汉字记谱方式来说明西方基本乐理,用选自《养心神诗》的圣歌做为教材范例。[54] 但杜嘉德的乐书都用文言文解说,而不似狄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就烈“用官话，不用文理，特为要使学生同学问浅薄的教友都便宜用”的做法更能起到普及音乐的作用。[55] 同样，李提摩太夫妇后来出版的《小诗谱》的序和凡例用的也是文言文。另外，杜嘉德的三本音乐书，只有第一本《养心诗调》的汉文有标点，其余两本《乐理頗晰》（见例 2）及《西国乐法》（见例 3）都没有标点，而狄就烈的《乐法启蒙》除了凡例和正文均用标点外，还采用了美国当时学校通用的简单的问答方式。在记谱法上，狄就烈改编后的《圣诗谱》也有别于李提摩太夫妇的《小诗谱》和杜嘉德的乐书。李提摩太夫妇的《小诗谱》用的是改造后的工尺谱。杜嘉德的《养心诗调》《乐理颇晰》起初用自创的汉式简谱，《西国乐法》“原本要以厦门人可以理解的十二地支，来对应西乐黑白键的十二个音，显然他理解到，这样下去会愈解释愈复杂，于是就此打住，直接沿用简写汉字来对照西方十二音，並开始以五线概念直接切入三声部、四声部的实例。”《乐法启蒙》介绍的是的首调唱法的“主音嗖乏”体系。[57]


養心詩調續敘第二帙有半級樣式明各大級之間能入半音然只略言未盡其義嗣有略詳者乃惟⊗字而於⊗之意言之亦淺茲欲明晰宜究換律之法蓋前所論之法乃全調維一律而已然調中或時可換律恆以⑤為新㊀或以⊗為新㊀如以左畔樣為舊而右畔樣即為新

Exercises in Change of Key

（例 1）


同治庚午季冬

樂理頗晰

廈杜嘉德撰

新街拜堂藏板

（例 2）



（例 3）

结 语

以上针对目前狄就烈《乐法启蒙》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重点谈到了狄就烈的生平、她的为人、《乐法启蒙》的不同版本和《圣诗谱》中引进的符号记谱法。需要指出的是，狄就烈对音乐活动的重视和登州文会馆音乐课程的开创并非偶然，是与校长狄考文的教育理念分不开的。狄考文和一般的传教士不同，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在中国的成就证明他更是一个教育家。狄考文夫妇在教育背景和办学的理念上和最早在香港马礼逊学堂开设音乐课的布朗（Samuel R. Brown, 1810-1880）很相似。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式教育存在着许多缺点，其中最有害的一点是对儿童创造想象力的桎梏。针对中国旧式教育为通过科举而强调死记硬背这一缺陷，他主张在教学中引进西方现代科学和艺术方面的知识。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发挥出学生自由思辨的潜力。狄考文也很注重音乐的功用，是最早把音乐教育提到教会学校教育日程上的传教士之一。早在 1877 年他就在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宣教会议上呼吁“传教士不仅应具备教中国典籍的能力，而且应有教授真正教育所有学科的能力，如地理、数学、音乐、历史、自然哲学”。[56] 在 1881 年夏发表在《万国公报》的一篇题名为《学校振兴论》的论文中，狄考文除了详细地介绍美国的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大学、女学教育制度外，还特别提到美国学校中所授的科目，如医学、法律、神学、音乐和兵军事略等。除了用歌声来颂扬耶稣基督，音乐可以说是作为情感审美教育的一种手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被引进登州蒙养学堂和文会馆的教学中来的。

＊ 本文中所用《文会馆志》、《圣诗谱》1892 版年英文序和《圣诗谱》（1907）为孙继南先生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注 释：

① 王震亚〈西洋乐理输入探源〉，《音乐研究》1990 年第 4 期，页 62–64。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页 162–165。伍雍谊《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页 346–347。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山东友谊出版社），页 3–4。

② A.Williamson,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9, No. 7（1878），p. 309.

③ 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抄选” 的发现经过〉，《音乐研究》2006 年，第 2 期，页 74。

④ Justus Doolittle, *A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Foochow: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1872），Vol. II, pp. 307–308.

⑤ 见注 1。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⑥ Gerlinde Gild,"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Musical Theory and Terminology under Western Impact" in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eds.,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4), pp. 554-575. 朱京伟〈近现代以来我国音乐术语的形成与确立〉,《中国音乐学》1998 年第 2 期,页 99-114。

⑦ 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抄选"的发现经过〉,《音乐研究》2006 年,第 2 期,页 73-77。刘再生〈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山东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抄选"之史料之史料初探〉,《音乐研究》2006 年第 3 期,页 39-49。

⑧ 施咏、刘绵绵〈《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探源、释义与评价〉,《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6 年第 1 期,页 83-87。

⑨ 见上注,页 84。

⑩ Annetta T. Mills,"Julia Brown Mateer",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29, No. 5 (1898), pp218-222. 梅耐德 1887 年与其夫梅理士(Rev. Charles R. Mills)创办登州启喑学馆,是最早将西方现代聋哑人教育引入中国的传教士。狄氏夫妇刚到登州时,因为找不到住房,两家还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三十多年,两家虽不住在一起,但颇多来往,直到 1895 年狄就烈逝世前三年梅氏夫妇才迁到烟台。

⑪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 Ma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59-164.

⑫ 狄考文的续弦夫人狄文氏(Ada H. Mateer)和狄就烈一样也从事教育,她辑著的《女子须知》(上海华美书局,1909)曾印行多次,流传颇广。

⑬ Robert M.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New York, Chicago & Toronto: Fleming H. Rovell Company, 1912), p20.

⑭ 以上资料来自 Mills,"Julia Brown Mateer", p218;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p23.

⑮ 参见 Hyatt,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pp139-190.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

⑯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p43.

⑰ Hyatt,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p159.

⑱ 朱葆琛〈狄夫人邦就烈事略〉载《文会馆志》(潍县: 1913),页 12。

⑲ 同上注。参见 Hyatt,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pp159-164.

⑳ 朱葆琛〈狄夫人邦就烈事略〉页 11。参见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p19.

㉑ Mills,"Julia Brown Mateer", p219.

㉒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 pp136-137.

㉓ Hyatt,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p92.

㉔ Charles Hodge Corbett,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loo)*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pviii.

㉕ 朱葆琛〈狄夫人邦就烈事略〉页 13。

㉖ 同上注, 页 12。

㉗ 孙继南 2004 年 4 月 26 日与作者私人通信。

㉘ Julia B. Mateer, "Preface" 载《圣诗谱》(上海:美华书馆, 1892)。

㉙ George N. Heller, "Music in Kansas Grade Schools from 1870 to 1900: A Study of Organization and Growth." *American Music*, Vol. 3, No. 4 (1985), p464.

㉚ Sondra W. Howe, "Swiss-German Music Books in the Mason-McConathy Collection: Accounts from Europe to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Vol. 48, No. 1 (2000), pp26-38.

㉛ Phil D. Perrin, "Systems of Scale Not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Tune Book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Vol. 18, No. 3 (1970), pp259-261.

㉜ Paul G. Hammond, "Jesse B. Aikin and The *Christian Minstrel.*" *American Music*, Vol. 3, No.4 (1985), pp442-444.

㉝ 关于格文与"主音嗖乏"法的兴起,请参见 H. Watkins Shaw, "The Musical Teaching of John Curwe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Musical Association* Vol. 77, No. 1 (1950), pp17-26.

㉞ 最早用这种方法的应该是苏格兰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他的乐理书《养心诗调》(1868 年)虽然用的是自己发明的简化汉字记谱法,但"所教之法大略乃英国乐师名格文 [Curwen]"。见杜嘉德《养心诗调叙》(厦门: 出版者不明,1868),页 5。杜嘉德的《乐法启蒙》(1869 年出版)用的可能也是这种体系。参见江玉玲〈十九世纪末西学东渐中的音乐史料—浅谈杜嘉德乐理书的伯德雷恩藏本〉,《台湾音乐研究》2006 年第 3 期,页 10。

㉟ 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存有此乐谱的显微资料。关于此书, 可参见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 页 169-170。

㊱ 狄就烈〈《圣诗谱》原序〉载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页 93-96。

㊲ Mateer, "Preface"。

㊳ ammond,"Jesse B. Aikin and The *Christian Minstrel,*" p442.

㊴ Corbett,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p16.

㊵ 李提摩太夫妇早期在山东和山西传教时,最初用的也是"主音嗖乏法",在接触到工尺谱后,他们又决定采用工尺谱。其原因就是工尺谱是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记谱法,用的是中国人熟悉的汉字,学起来方便,能更好地协助传教,但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人们学会五线谱。

㊶ 早在 1854 年倪维思夫人就在宁波教过"大约 40 个男童,30 个女孩"五线谱。见 Helen S. C. Nevius, *Our Life in China* (New York: Hurst and Company, 1868), pp39-40.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㊷ 王震亚〈西洋乐理输入探源〉,页 52。

㊸ C. S. Champness, "Hymnology in the Chinese Church, II" in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p248. 关于基督教赞美诗集在中国的发展和本土化, 请参见 Vernon Charter, and Jean DeBernardi, "Towards a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 Processes of Musical and Cultural Synthesis", *Asian Music*, Vol. 29, No. 2 (1998), pp83–113.

㊹ 梅耐德说"狄就烈编辑了最早的官话赞美诗"(Mills, 1898:221),其实 1862 年天津出版的《耶穌教聖詩》才是最早的官话赞美诗集,倪維思 (John Livingston Nevius, 1829–1893) 也早在 1864 年就编辑出版过一本北方官话赞美诗集。

㊺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大洋洲等非西方社会也都发生过。类似的研究请参见 Amy K. Stillman, "Prelude to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Protestant Hymnody in Polynesia",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Vol. 25 (1993), p91.

㊻ 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存有这两部赞美诗集的缩微资料。

㊼ David Sheng, "A Study of the Indigenous Elements in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 (D.M.A.,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64), pp495–496.

㊽ A.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o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244; D. MacGillivray, "A List of Hymn Books" in *China Mission Yearbook* 1912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p256.

㊾ Sheng, "A Study of the Indigenous Elements in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 " p98.

㊿ 见上注, p100.

51 见上注, p. 502. 陈伟〈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概况〉,《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页 40。

52 关于《小诗谱》, 可参见刘奇〈李提摩太夫妇与《小詩譜》〉,《音乐研究》,1988 年第 1 期,页 22–27; 英文论述请参见笔者的博士论文 "Missionaries, Reformers, and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Music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39–1911" (PhD Thesis, Auckland University, 2006), pp126–147。

53 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存有《养心诗调》、《乐理颇晰》和《西国乐法》原件,澳大利亚莫纳什(Monash)大学存有复印本。关于杜嘉德和他的乐理书系列,笔者将另撰文论述。

54 江玉铃〈十九世纪末西学东渐中的音乐史料–浅谈杜嘉德乐理书的伯德雷恩藏本〉,《台湾音乐研究》,2006 年第 3 期,页 5。

55.狄就烈《圣诗谱》(上海:美华书馆, 1907), 页 11。

56 江玉铃〈十九世纪末西学东渐中的音乐史料〉, 页 11–15。

57 Calvin W. Mateer,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May 10–24, 1877, Shanghai*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171.

参考文献:

[1] 书籍

Corbett, Charles Hodge.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loo)*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狄就烈《西国乐法启蒙》(上海: 美华书馆, 1872 初版, 1979 补编重版)。

狄就烈《圣诗谱》(上海:美华书馆, 1892 版, 1907 版)。

Doolittle, Justus (1872). *A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Language* (Foochow: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Vol. II.

杜嘉德《养心诗调叙》(厦门: 出版者不明, 1868)。

Fisher, Daniel W.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

Gong, Hong-yu (宫宏宇). "Missionaries, Reformers, and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Music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39–1911" (PhD Thesis, Auckland University, 2006).

Hyatt, Irwin 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Cambridge,Ma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Mateer, Robert M.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New York, Chicago & Toronto: Fleming H. Rovell Company, 1912).

Nevius, Helen S. C. *Our Life in China* (New York: Hurst and Company, 1867).

Sheng, David. "A Study of the Indigenous Elements in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 (DMA.,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64).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珠海出版社, 1999)。

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潍县:1913)。

伍雍谊《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Wylie, Alexander.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o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6)。

[2] 论文、回忆文章

Champness, C. S."Hymnology in the Chinese Church, II" in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陈伟〈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概况〉,《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页 38-43。

狄就烈〈《圣诗谱》原序(1872)〉载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页 93-96。

Gild, Gerlinde.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Musical Theory and Terminology under Western Impact" in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eds., *Mapping Meanings: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4), pp. 554-575.

Hall, Paul M."The Shape-Note Hymnals and Tune Books of Ruebush-Kieffer Company", *The Hymn*, Vol. 22, No. 3 (1971), pp. 69-76.

Hammond, Paul G."Jesse B. Aikin and The *Christian Minstrel." American Music*, Vol. 3, No. 4 (1985). pp442-451.

Heller, George N. "Music in Kansas Grade Schools from 1870 to 1900: A Study of Organization and Growth." *American Music*, Vol. 3, No. 4 (1985). pp460-466.

Howe, Sondra Wieland. "Swiss-German Music Books in the Mason-McConathy Collection: Accounts from Europe to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Vol. 48, No. 1 (2000), pp26-38.

江玉玲〈十九世纪末西学东渐中的音乐史料-浅谈杜嘉德乐理书的伯德雷恩藏本〉,《台湾音乐研究》,2006 年,第 3 期,页 1-20。

刘奇〈李提摩太夫妇与《小诗谱》〉,《音乐研究》,1988 年,第 1 期,页 22-27。

刘再生〈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山东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抄选"之史料之史料初探〉,《音乐研究》,2006 年,第 3 期,页 39-49。

MacGillivray, D."A List of Hymn Books" in *China Mission Yearbook 1912*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pp252-258.

Mateer, Calvin W.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May 10-24, 1877, Shanghai*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p. 171-180.

Mills, Annetta T. "Julia Brown Mateer",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29, No. 5 (1898), pp218-222.

Perrin, Phil D."Systems of Scale Not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Tune Book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Vol. 18, No.3 (1970), pp257-264.

Shaw, H. Watkins. "The Musical Teaching of John Curwe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Musical Association*, Vol. 77, No. 1 (1950), pp17-26.

施咏、刘绵绵〈《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探源、释义与评价〉《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6 年,第 1 期,页 83-87。

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抄选"的发现经过〉,《音乐研究》,2006 年,第 2 期,页 73-77。

王震亚〈西洋乐理输入探源〉《音乐研究》,1990 年,第 4 期,页 58-66。

Williamson, A."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9 No. 7 (1878), pp. 307-309.

朱葆琛〈狄夫人邦就烈事略〉载《文会馆志》(潍县:1913)。

朱京伟〈近现代以来我国音乐术语的形成与确立〉,《中国音乐学》,1998 年,第 2 期,页 99-114。

(上接第 80 页)

参考文献：

[1] [2] [3] 黄顺力.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 [M] .岳麓书社,2005.4.

[4] 冯贵芬.制洋器议 [A] .校邠庐抗议 [C]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98.

[5] 王韬.达民情 [A] .韬园文录外编 [C] .上海 :上海书店,2002.56.

[6] 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 [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98—99.

[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二卷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534.

[8] 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 [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101.

[9] 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 [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102.

[10] 夏晓虹.军歌 [J] .读书,2000,(6)

[11] [12] [13] 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 [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14] 夏晓虹.军歌 [J] .读书,2000,(6) :85.

[15] 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 [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16] 向延生.中国近代音乐家传 [M]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17] 张静蔚.搜索历史 [M]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18] 汪毓和.中国近代音乐史教学参考资料 [M] .兴界图书出版公司。

[19] 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 [M]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20] 汪毓和.中国近代音乐史教学参考资料 [M] .兴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21] 谢天振,李小均.傅雷—那远逝的雷火灵魂 [M] .文津出版社,2005.223.

[22] 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 [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